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五期 ——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11e)

【研究报告】“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林小波
【读史笔记】从“小四清”到“文革”——一个华南乡村的“运动”考察	单世联
【史料辨析】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并非揭露林彪	金春明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一)	老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四清”运动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 林小波 •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 ◇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一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 刘少奇：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社教去年也打了败仗。

◇ 毛泽东：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

1963年5月杭州小型会议以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在运动试点中，大多数试点的情况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经济退赔普遍偏严等。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在九月工作会议上，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规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向全体群众宣读两个“十条”，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的范围开展起来。

此时，中国的周边形势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汤风雷激”了。中苏两国关系急

剧恶化，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看得非常严重。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

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8月16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及中央写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议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即进行大兵团作战。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初是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8月18日，毛泽东复信：“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但随着各地反映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逐渐改变了看法。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笏、刘仁、刘子厚谈话，了解到华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按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毛泽东当场向秘书吩咐，说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开会。并说：“到北京开会，你（李雪峰）带几个人去好助威呀，到北京打一仗。也许你们打赢，也许打败，打败也不要紧。文件缓发，何必急，急什么。”出门上车后，毛泽东又说：“也可以写活点，何必一个样？你（李雪峰）还是带几个人去，助助你的威么。”26日，刘少奇从南方回京。27日，即找李雪峰、陶鲁笏、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笏回忆，刘少奇同志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另外，田家英跟随刘少奇赴广州修改《后十条》时，在飞机上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即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点，但刘少奇在主持修改《后十条》时并未采纳。8月份的大区书记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毛泽东也没再提出不同意见。

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应该说，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方法，而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不行了，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刘少奇在视察时，也谈到了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总的看来，肯定的较少，否定的较多，甚至认为打了败仗。8月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讲：“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我看主要是起了刹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

数单位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这就是说，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了胜仗。”8月6日，刘少奇在湖北党内负责干部会上指出：“据我的估计，恐怕你们过去搞的这一些，大部分是不彻底的，还有一些根本没有搞开。是不是大部分不彻底或者走了过场，滑过去了？其他几省没有一个像样的社教经验总结。”

刘少奇的这些发言，对毛泽东而言，恐怕也是很难接受的。1965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这个工作可能还达不到三七开。讲整个历史，经常犯错误的，比如打仗，有些打败仗。土地问题，花了十年时间是逐步认识的，开始写了几条，不完全，那叫缺点，不认识啦。一个历史结论往往要几十年才能总结。”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不满。1964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到南京视察“四清”运动，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不蹲点十分不满，并发了脾气。在8月底召开的有六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刘少奇专门找江渭清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的讲话，并严厉地责问江：“为什么不学习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9月30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写了回信，继续批评江的错误，并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该说，刘少奇的话并无错误，但在那个党内个人崇拜风气甚重的年代，刘少奇的这段话也就与众不同了。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批示：“你的信写得很好”，“觉得实在好”。但随后，毛泽东又改变态度。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华东地区包括魏文伯、谭启龙、江华等都到会，并未通知江渭清参加，但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通知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找江渭清谈话，问江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并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的意见是错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重不满，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愈积愈深，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从而也使“四清”运动变得复杂起来。

◇ 刘少奇：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 毛泽东：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964年12月15日下午3点30分，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主要发言。他在讲话中传达了会议的预定开法，并且提出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当天的会上，周恩来也作了反修报告。刘少奇讲话之后，会议从16日至19日接连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对前段运动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各中央局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12月19日下午3点半到6点半，大会在魏文伯、谭震林发言之后，宣布从明天起，工作会议停开几天，开时再通知。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觉到，毛泽东

说的“有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在发言中讲到：“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

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说：“主要矛盾是不是这样，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

毛泽东回答：“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应该说，12月20日的常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坚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满。而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但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提法。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委会大不相同。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他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决不是

批评李富春的。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毛泽东的话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陈伯达发言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毛泽东插话说：“清朝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陈伯达讲：“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当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一些负责人汇报了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到保定地区新城县的试点情况时，毛泽东打断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彭

真、陈伯达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刘少奇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他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后，“文革”爆发了。

□ 原载《党史博览》

~~~~~

## 【读史笔记】

### 从“小四清”到“文革” ——一个华南乡村的“运动”考察

• 单世联 •

随着国外有关“中学”论著的不断引进，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了像余英时、张灏这样的华裔学者外，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精微的观察和精到的研究，如《叫魂》的作者 Philip A. Kuhn，不但掌握了宏富的资料，且对中国心灵有极深入准确的洞察和体验，他们的成果，即使久居本土、一心问学的中国优秀学人也难以企及。感觉不足的是，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海外“中学”中的当代部分还引进得不多。

1975年，三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澳州的陈佩华(Anit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美国的赵文词(Richard Madsen)在香港偶然遇到几个来自广州附近陈村的移民，从听到的一些轶事中，三位学者萌生了进一步了解陈村的愿望。此后几年，他们有意识地结识并采访了26位移居香港的陈村移民，于1984年出版《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1989年，他们第一次前往陈村做实地考察，补写了1981年后的变迁，于1992年推出该书的增订本。199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社会与思想丛书”中收入此书的中文本。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夺取政权、改造中国为目的，但真正颠覆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的革命，还是发生在49年以后，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到文革，农村的组织结构、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确实饱经“沧桑”，政治化潮流席卷农村大地。尽管从长时度、“大历史”的眼光来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才真正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耕作行为，一种被统称为“现代化”的诸种要素侵入到中国农村，但毫无疑问，此前30年以政治运动为方式进行的社会改造，却以其巨大的社会震荡和经济代价而在当时和今天都显得触目惊心，也令对这一切觉得新奇和震惊的外国学者兴味盎然。《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陈村的政治运动或政治运动中的陈村。

由于三位作者接触的主要是70年代后移居香港的陈村居民，这些人了解的主要是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所以这本书所描述的陈村政治运动主要是从1964年的“小四清”到1966年开始的“文革”。

#### 1、运动的领导

49年以后，中国大陆进入一个运动不已的时代。简单地说，运动是由最高当局借助专政体制由上而下地发动起来的社会改造工程，它是由人调控、掌握的客体。因此才有“发动运动”、



“争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运动的大方向”、“把运动进行到底”、“巩固运动的成果”之类的常用词，表明在运动之上还有人。

这个“人”是谁？当然是各级领导运动的人。“领导运动的人”与“领导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像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却不是“文革”的领导人一样，从“小四清”到“文革”，历次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恰好是各级干部，所以陈村的支部书记陈庆发与大队长陈龙永并不一定就是陈村运动的领导人。

1964年的“小四清”的意在铲除各级干部中的腐败现象，陈村的运动由陈庆发组织领导，陈龙永受到批判；1965年的“大四清”，四清工作队接管陈村的运动领导权，他们组织群众揭发批判陈庆发的错误，重新选举陈村领导。

运动的目的是整领导，但“小四清”既然由陈村的党的最高领导陈庆发领导，那么被整的人至多只能是村里的二把手陈龙永，但陈庆发也是要整的对象之一，所以“大四清”的领导就是“上面”来的工作队，陈庆发从此下台。“小四清”和“大四清”的区别之一，就在它们“清”的对象有大小之别，前者由当地最高领导人领导，后者则由“上面”派人下来。由此上推，“上面”也难保正确，它也不可能永远充任运动领导。

于是，至少在形式上，在发动“文革”时，毛泽东绕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机构，一度以底层群众、红卫兵为运动的动力。陈村下放知青被鼓动起来造反，他们组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矛头指向现任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工作队也不甘被动，他们把亲官方的、家庭出身好的知青聚集起来，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之对抗，把村民的注意力从大队干部转向“黑五类”。在毛泽东宣布工作队镇压群众之后，陈村工作队撤离。但原有的一套组织系统瘫痪后，造反的知青又不可能接管陈村政权机构（既无上级任命，又无民意基础，更乏管理能力），陈村一度出现权力真空，无人领导运动。

在运动可能失控的情况下，1967年春，解放军进村组织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作为陈村的行政机构以稳定农村形势。“小组”成员是从陈村的贫农中选拔的，原领导陈庆发、陈龙永均不在其中，但“小组”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工作上实际依靠陈龙永，陈本人也乐于充当顾问并借以东山再起。1969年，“文革”降温，上面再次派出工作组重建陈村权力结构，陈龙永和陈庆发分别为一、二把手。“前度刘郎又重来”，与“小四清”前相比，他们只是换了一下位置。

从64到69，运动整整折腾了五年时间，陈村的原领导人在不同的运动阶段都曾是运动的对象，但运动的领导权依然落在他们手中（陈龙永基本上没有中断对陈村的控制）。如果革命就是权力更迭，那么陈村其实没有发生革命；如果“文革”就是打倒当权派，那么陈村的当权派则是打而不倒。

这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和革命，总得有人组织领导，否则运动就不能开展。无论怎样以彻底革命为动员，运动所能改变的只是领导人的姓名，而不可能是控制性的权力结构。陈庆发—工作队—解放军—陈龙永，谁来坐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陈村这几千个人得有人管，陈村的五百多亩土地上得有人干活。运动领导人从陈庆发到陈龙永之间的转换，源自运动的内在逻辑。整小官（陈龙永、陈庆发）要由大官（陈庆发、工作队）来领导，而谁也不能保证“大官”不会出问题，在运动的总根源毛泽东看来，“大官”的问题更其严重，小官整完了就要整“大官”，毛泽东以下的“大官”都免不了挨整。运动的逻辑就必然把它的对象由小官步步上溯，直到二号人物刘少奇。事后不难看出，当陈龙永下台时，刘少奇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如果整小官要大官来领导，那么根据运动总要有谁来领导的原则，整“大官”

的领导就是小官，所以当“大官”或刘少奇要为一切错误负责时，陈龙永这类小官就被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确有自下而上的一面。这是二陈在陈村打而不倒的外在背景，或许也是以反对官僚主义的为动员的运动，结果总是加强了官僚主义的结构性的原因。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二十多年的陈村衙门实际上没有出现新官，这又有陈村的特殊情况：“共产党来后，陈村贫农中凡是聪明能干的都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像陈庆发和陈龙永这样的，都已升任大队和小队干部。实际上由于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职位不少，成年男性公民有整整三分之一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干部。因此，当工作队特意要从真正贫农中找非干部的人选时，选择的余地就很有有限了。”（P 47）二陈的阶级出身无可挑剔，意志坚强，演说能力很强。特别关键的是，两人都是干活的好手，“在我们村里，要是你干活的本领不过硬，你就别想领导别人，你说话就没有号召力。”（P 27）陈村数千人中就数他们能力强，除了下放知青和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几十年中没有人向他们挑战。二陈的欠缺主要是在文化上，陈庆发是文盲。只是在这点上，下放知青比二陈具有优势，但知青们既无村民的支持，也缺乏领导村民的能力。造反的红卫兵曾到大队：“邓华侨先开口：‘我们夺权来了！’大队秘书说：‘你们想夺权，那就拿好了！’他取出大队的图章说：‘好吧，谁要？’可是谁都不敢接。这个来得太突然了。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得夺权是怎么夺法。大家忽然想到，如果接下了，明天一大早要是有人找上门，我们就得决定盖章与否。我们还得领导生产计划。但是，这些我们全都不懂，根本没有经验。”（P 111）从1955年的合作化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基本一贯。集体化历时25年，刚好是一个世代。这一代农民中少数“强人”与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是连体共生的，运动造就了他们，他们推动了运动。只要此一体制不变更，运动和革命虽可把他们打倒一时，却不可能抛弃他们。

## 2、具体化

运动的源头远在北京，运动中的陈村一直被束缚在一个由国家所编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巨网中，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自上而来的运动要在陈村掀起波澜，就非得陈村人的搅动。这种搅动不只是消极地配合、应景，而是陈村既有矛盾的反映和激化。既然是陈村的运动实际上是由原来的领导人领导的，它也就是“运动”与“陈村”的互动。

事实上，从“小四清”到文革，陈村的运动几乎都以二陈之间的矛盾斗争为中轴。他们原有权力之争，加以两人都意志坚强、性格固执，潜在的冲突早已有之，运动使之公开化。陈庆发在“小四清”中以腐败之名整倒陈龙永，他自己却在“大四清”中因徇袒亲友和贪图享受而被批判，“文革”中更因霸道而下台；陈龙永却在此期间保住职位；“文革”混乱中，陈龙永自动离职，但仍掌实权；陈庆发不甘失败，阴谋复辟，受到陈龙永的严厉打击。1970年“落实政策”，陈庆发重进支部，二陈表面性地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下和解。1979年，陈龙永因“逃港风”引咎辞职，陈庆发复任支书；1983年，陈龙永借“清除精神污染”之机再度扳倒陈庆发。直到1986年陈庆发车祸丧生，绵延几十年的二陈之争才告结束。

如果没有运动，二陈之间也会有权力较量，但运动给他们的争斗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两人都学会了操纵运动，用官方话语来打倒对方。在第一个回合中，陈庆发就利用四清“教龙永老实安分，让他知道庆发的厉害。这样，龙永以后就会听话，再不敢向他挑战。”（P 34）但运动的连续性、经常性，又使每一次的斗争成果不可能长期保持。“小四清”结束后，陈庆发本来已官复原职，“他又回到党支书的宝座，也许就因此认为运动已经完全结束了，他又可以随意发火了。”（P 89）结果当然又给拉下来。此后陈龙永也如法炮制，借运动打击陈庆发。只要运动不断，任何人的现有位置都不可能稳定，这倒形成了一种非民主的平衡机制，此起彼伏、不断消长。

毫无疑问，“上面”不是因为二陈之争才发动运动的，相反，运动的目标都很大，都是事关党国前途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把此一“宏大叙事”落实在陈村这一特定场景中，需要一种转换。转换就是运动的“具体化”，也即“地方化”，它的前提，是运动本身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可解释性。比如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中央规定要清理六种人：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文革中的坏头头和黑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除刑事犯外，其他五类都不确定，“传达到小老百姓谁也弄不明确，到底谁是人民的敌人，到底谁该被清出‘阶级队伍’，这就给有意报私仇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子。”（P 132）此前陈庆发曾试图翻“大四清”的案，陈龙永就抓住这一点，再翻出他的历史（虽然从小赤贫，但其祖父和父亲毕竟曾是地主），把他打成自觉的反革命而加以整肃。

完成运动“具体化”的转换需要政治敏感和分析联想。如果运动给陈村人带了什么积极后果的话，那就是这种特殊的“政治素质”的提高。

首先要选择斗争对象。运动要找靶子，地富反坏右这些红色中国的“贱民”当然每次都免不了，但这些已经被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脚的人，从来不是运动的发动者与参与者的主要目标，正像陈村的共青团书记说的：“每回斗争总得揪人。哪怕材料不足，也得拉出一个人。真也好，假也好，都得挖出材料。”（P 191）

1969年，陈村要把十个小队合并为五个小队，七、八小队要合并为新四小队后矛盾很多，原来两个队长如何安排也很麻烦。陈龙永巧妙地让原八队的党员队长“老不休”当政治队长，让管理生产上稍胜一筹的七队长露笋当生产队长。由于意识形态挂帅，政治队长似乎高一等；但由于小队的任务主要是生产，生产队长的实权又似乎大一些，两人之间当然就摩擦不断。给这事添枝加叶的是，“老不休”的儿子爱上了的一个姑娘转而要嫁给露笋的小舅子黑仔。不久发现队里的大米少了两袋，有人揭发说他们曾撞见黑仔扛着一袋米往那个姑娘家走。在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时，一个新任本队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下放知青吴某跳出来，他觉得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和集体利益是辅导员的责任，就以黑仔的姐姐（露笋的老婆）总是偷东西为由说大米一定是黑仔偷了。“老不休”一派的人当然附和这一指控，双方的冲突公开化，全队的干部和群众分成两派，生产积极性受挫，一季下来粮食减产，收入下降，并威胁着即将到来的1971年的春耕。

此时刚好展开一场叫“一打三反”的运动。陈龙永既要给运动找出靶子，又要“杀鸡儆猴”解决新四小队的纠纷。本来出身不好的农民是现成的靶子，但这些人给运动搞怕了，这一次都小心谨慎，没有卷入“老不休”和露笋的冲突。陈龙永选择了无意中卷入派系之争的吴某：“从几个方面看，吴的确是上乘人选。首先，他深深卷入了这场争端，却又不像露笋或‘老不休’那样的干部，受人尊敬、举足轻重。他又是外来之人，在当地并无亲戚这层保护网。他也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毋须顾忌。此外，他在文革中曾跑广州厮混，言行不检。总之，他小辫子太多。（P 192）”最令人惊讶的是：“龙永代表大队决定，上吊的绳子还需吴某自己提供。龙永据说曾告诫同僚：‘让他继续胡闹一阵子，越凶就越好办。’同时，大队官员悄悄地搜集吴某的新材料，网罗各种人证。”（P 192）在“引蛇出洞”上，陈龙永这个农民不比毛泽东差。“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几个治保人员带领一支武装民兵，趁天色犹明的傍晚在家中逮捕了吴某。”（P 192）罪名早就准备好了：制造纠纷，破坏陈村的革命和生产。吴某被关进了“牛棚”等待上级的裁决，露笋和“老不休”给吓住了，停止了彼此之间争吵。“一打三反”运动在陈村划上句号。

选择了对象之后就要对他进行批判。像“四清”、“文革”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几乎是整倒一大片干部，但实际上，多数基层干部固然经常利用职权搞特殊，人品也不好，但要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路线问题，却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推理逻辑。“小四清”时陈庆发要整陈龙永，起

因是大跃进结束时后者得到前者的同意“买”了大队的一些木料，运动开始后陈龙永不得不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按常规，招认之后补上木料的钱就算了，但现在是运动期间，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陈庆发说：“大队长承认他滥用职权，这没错，但这一行为的错误性质要比滥用职权还更严重。我这么说，大家同意不同意。群众齐声高喊‘同意！’其实群众哪有选择余地，哪敢说不同意。”（P 3 6）事情就这么大，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就搞不成运动，所以对事情的性质进行分析，“事情”是具体的（拿木料），性质是抽象的（“大搞腐败的典型”）。分析的任务是把具体的事情与抽象的性质挂上钩，其方法是借助联想和放大把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使之与运动的对象相符。陈庆发接受一个香港人的金项链一事，就可判断他背叛了无产阶级立场；邓华侨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批判者就认定：“就算他没有亲手杀人，但他说过的那番话却可能造成几千人的头落地！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受其毒害，企图复辟资本主义。”（P 1 6 4）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有这个特长，比如陈村的运动红人程红颜，就“比谁都热衷于把琐碎事故说成重大思想问题”（P 1 0 0）

批判还有方式方法问题。黑格尔说学习游泳就要到水里去，村民和知青都在运动中学会了如何做运动员。“文革”中陈龙永组织斗争陈庆发，“但在各种斗争会上他都有意躲在幕后。由于四年前小四清时庆发亏待过他。龙永知道，如果由他出头整治庆发，就不免招来公报私仇的嫌疑。”（P 1 4 8）所以他让一个被称为“秃子”的治保会主任直接出面。秃子是一个除了“办事不公”外没有给村民留下其他印象的人，但这一次，他却要让村民对他的整人术刮目相看了：陈庆发不识字，“治保会得以趁空使用严重的字眼把他的案子呈报上级党委。治保会的定案报告不仅包括旁人的揭发，还有据说是他本人承认的供词。整个文件充满夸大不实之词和添油加醋的供词。这个报告倒是大声地读给他听了，可是读得速度很快，他没来得及弄明白所有文字的含义，便按上手印同意了。”（P 1 4 9）普通的农民都给运动锻炼成精了。

无论“上面”发动什么运动，一旦进入陈村，就和陈村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运动有间歇，而且每次运动都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目标，但由于在陈村从事运动的总是这么些人，因此运动在陈村就有高度的连续性和自我再生产的机能。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报复性的连续。四清时工作队培养的一个被叫做“矮冬瓜”的年轻人曾积极批斗陈龙永，“文革”中矮冬瓜和一个女人私通，陈龙永就召集群众大会来批斗，把这件本属私生活的问题提升为运动主题。二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在村民中造成了恐怖，“任何漫不经心的言行失误，都可能授人以柄，让人拉到台上，面对虎视眈眈的群众。这种恐怖之感加深了村民彼此间的疑忌，转而揭发出更多的罪恶分子，举行更多的批斗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武断现象，结果使人人的自危之感进而加深一层。整个情势便如此恶性地循环下去。”（P 1 5 4）每次运动都为下一次运动准备了题材和潜力。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说二陈是假公济私了。如果没有他们，陈村的运动就至少丧失了部分动力，没有多大搞头了。他们利用了运动，运动也借助了他们，少了任何一方，运动都不可能“轰轰烈烈”，任何农村运动都是运动的普遍目的与各地具体实践和结合。

### 3、三种人

“运动”不断，天怨人怒，但它之所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频仍发生，肯定是有人需要它。在陈村，需要运动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寻找机会整倒对手的干部，以二陈为代表。

第二种是对干部有私愤的人。比如“四清”时，向干部猛烈开火的人包括：“过去有病或有困难找某干部帮忙，结果不能完全如愿的人；有要求建房，但因地点不对，得不到干部批准的人；另外，有的人是因为嫉妒干部偏爱其他农民而非自己；甚至还有计较三代之前仇恨的人。

这些理由全部出于自私的个人动机，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说的‘阶级斗争’”。（P 5 4）他们需要运动提供一个合法的出气孔。

第三种人是不满现状或有挫折感的下放知青。1964年有50个广州知青下放到陈村，他们既有满怀革命理念又充满自我实现的抱负，是陈村真正具有政治意识的人物。但逼窄的陈村并不是他们的广阔天地：他们在生产上不能与农民相比；他们的文化知识不可能在日常状态下展露；他们人生抱负、社会理想不可能在陈村实现，不但获得提升的只是少数几个，能够入团也不多，“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只有五六个青年可以说是混出了头。”（P 9 9）这就给那些出身不太好、却极想出人头地的知青们造成前途不明之感。“他们认为自己干活不少，却没有得到大队和四清工作队应有的赏识。这一帮积极分子也想进取，往高处爬，并不想一辈子当普通农民。他们大多属于中间阶级出身，是白领阶级或其他专业者的后代。在这以前他们并不曾感受过歧视的滋味。他们厌恶‘阶级路线’，在官方加强阶级路线教育的时候，他们还不觉得太受威胁，但到了1966年他们私下里就开始埋怨不已了。”（P 10 1）把“文革”之火带进陈村的知青小李后来说：“那时我觉得哪怕我们比那些出身好的人更积极、更聪明，也不可能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就因为我们出身不好，我最不满的就是，自己的前途让阶级标签卡死了，看着自己每天一大早扛个锄头下田锄地，我禁不住要想：难道这一辈子就这么下去？放眼四周，多么落后的地方啊！”（P 10 1）造反派的首领邓华侨原是毛泽东思想辅导员，工作队因其性格固执而不让他干这份表明政治上受信用的差事，也不让他沾手其他好差事；因为他有技工才能，就让他去装配村里的碾米机，为此又和同样固执的陈龙永争执不已。由此他明白“无论在陈村现有的政权下，还是在陈龙永手下当技术员，都没有前途，他早就有反叛情绪。”（P 10 6）不管是“四清”中的毛泽东思想辅导员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知青们都想象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通过改变现存的体制和习惯实现某种较为纯洁的、也是毛泽东思想教给他们的理想；他们与陈村村民没有血缘和宗族的联系，不会像干部们那样公报私仇或群众那样发泄私愤。严格地说，只有他们才是陈村运动的积极分子。

三种人都需要运动，但运动不会同时满足三种人的需要。

第一种人最幸运，他们能够通过运动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二陈的此起彼伏证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陈庆发倒霉的时间长一点，但他无需担心，只要运动不停止，原则上他总有翻身的机会。这些本是运动对象的人恰恰是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种人也算有所满足，不管运动的结局怎么样，至少他们可以在运动中发泄一下不满。他们最大的担心只是：“如果要在运动整某个干部，你就得把他彻底整垮，搞得他永不翻身。不然的话，以后的麻烦就没完没了了。”（P 5 4）尽管干部被彻底整垮的可能性不大，运动过后还是要用他，但群众也无需害怕，反正运动还会再来。

第三种人最为失望，他们真诚地参加运动，运动却背叛了他们。支持他们积极参加运动的是理想主义、政治理念，但这却与农民务实的经济关怀明显矛盾。“文革”前夕，一些知青担任毛泽东思想辅导员，负有教育村民的责任，但村民们都不喜欢这帮自以为是、自充老大的娃娃们，一个辅导员后来回忆：“他们所以反对我们，正是因为我们谴责修正主义，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做斗争。可是他们却说，我们辅导员都是‘口头革命派’”。（P 7 6）阿鸥是大队广播员，她“对这一工作十分专注，她坚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头等大事就是思想意识的转变，而广播工作则是推动这一转变的有效工具。”（P 7 8）于是她仔细搜集材料，不断在广播中表扬、批评，农民稍一偷懒就可能上广播，搞得村民对她敬而远之。小队干部也有意见，因为他们要保护的是本队利益，而阿鸥只对大队负责。“四清”工作队撤离后，积极分子王胖墩所在的生产队有几个干部的老婆与队长的老婆不和，丈夫们就想把队长撵下台，公开的理由是队长搞裙带关系。王胖墩是小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当其他干部提出队长的‘裙带风’问题时，他自然表

示了严正义愤的态度。胖墩是个充满政治热情的城市小青年，在他看来，干部保持清廉是个大事。可惜胖墩认为政治最为紧要的想法却和农民认为生产才是至要的想法并不一致。”（P 1 1 3）这个队长恰好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干活好手，结果胖墩的政治地位遽然下降。对于这些热情高涨的青年，“干部们不喜欢，因为在文革的头一年，全挨过他们的声讨。农民们也不谅解他们的桀骜不驯的举动。”（P 1 3 5）

不受欢迎倒也罢了，还要挨整。“清理阶级队伍”时，王胖墩和邓华侨等运动积极分子因不服大队领导，尤其不买陈龙永的帐，被扣上“打砸抢”的罪名，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后被关进“牛棚”，差一点被判刑。运动结束时，王胖墩感到“我的雄心壮志全破灭了。”（P 1 7 0）当运动把一次次的青春历险变成一次次令人灰心的经历，从而不再能聚集社会能量时，运动就不再有人需要了。

#### 4、两头“放”

运动是共产党政治艺术的结晶，也是它解决社会、政治冲突的万应良方。领导运动的关键是既要展得开，又要收得住。一般来说，展得开的要领是发动群众；收得住的诀窍是控制群众，“群众运动”的本意是群众被运动起来以达到领导的目的。当上面宣传群众是真正英雄、群众眼睛雪亮之时，它是要打破一潭死水的沉闷、揭开运动的盖子；当组织上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要加强一元化领导时，它是意在结束运动、收拾乱糟糟的局面。运动始终是领导幕后导演、群众登台表演，始终是领导“运”而群众“动”。

要整的对象主要是干部，要让长期受干部控制并欺侮的群众起来掀起运动高潮，需要更高一级的干部来“运”（动员），培养积极分子、承诺群众不受干部的报复等等都是必要的，而最重要的是鼓励、支持群众放言高论，对群众的任何言论都不加限制。一个四清干部这样说：“我们应该放手让群众来揭发。就算这里头夹带了个人私怨，也没有关系。横竖让他们说 如果工作队捆住了群众的手脚，弄得像小脚女人一样，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假如要求群众开口之前先拿证据，运动就根本搞不起来。我们当然也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在干部受到冲击的阶段，我们最主要的是观察他们自身的表现。到了运动最后‘落实政策’的阶段，定案时就只依据有真凭实据的指控已矣。”（P 5 9）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客观理性的论证，揭发，大胆地揭发；批判，无限上纲的批判。响彻行云的口号，森林般耸立的手臂，义愤填膺的控诉声讨，无论是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还是卑微琐碎的生活作风；也无论真实的官僚腐败还是乘机释放的私人积怨，只要能把平时耀武扬威的干部们斗得抬不起不来就成。陈村运动的积极分子阿鸥概括为“不管对不对，只管凶不凶”；（P 5 3）“越极端越好”。（P 1 3 3）确实，如果没有这些，气氛热烈的批斗会怎么能开成？群众又怎么发动起来？运动的必要性由此显出，运动的声势由此形成。知青小赵深有体会地说：“一点不假，干部真是牵着群众的鼻子走。”（P 1 3 8）群众本没有“鼻子”，但他们有气要出，放手让他们释放对干部的不满，就是给他们一个鼻子。当他们群情激昂地揭发批斗时，他们的鼻子就牵在运动领导的手中。

在“群众揭发”面前，顶不住疲劳轰炸的干部最后只能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切供认不讳，也许真能从中暴露出几个坏人，但更多的人，特别是久经运动锻炼的人明白，群众批斗只是运动的一个阶段，干部终究是干部，运动过后群众还得他们管。所以揭发批判后，下一步就要“缩小打击面”，给被批判者“落实政策”，改善他们的形象和声望。最后的处理并不依据群众的揭发。“大四清”时，陈村群众指控大队会计挪用了二千元公款，当时就按这个规格来批判他。“落实政策”时一查，认定他只拿了一百元，于是从宽发落。此前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对于群众而言是不说白不说，对干部而言是说了也白说，每次运动运动必然伴之以“热月”

反动。

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政治问题”大多是不真实的，当然更容易下结论。小赵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压了两个多月，多次坦白都因领导不发话而过不了“群众”的关。运动要结束了：“他们又叫我出来交代。实际上我这回说的和以前完全一样。龙永却站出来对群众说：‘这回他的交代比以前强多了！你们看他是不是老实了？’农民察看龙永的脸色，揣摩龙永的口气，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因此齐声喊道：‘老实了！’龙永接着问：‘我们该不放他？’大家都说：‘该，该，放了他吧！’这样，我就被释放了。”（P 156）问题不在于小赵自身，反正就是那么多事、那么多话，认识就那么高，交代是否能过关取决于运动进程：只要运动还不想结束，小赵的交代就要继续。

但运动到了哪个阶段，群众并不知道，他们永远看着陈龙永的脸色说话。已被“运动”起来的群众之接受操纵，是因为他们的牢骚、怨气已经得到发泄，他们已经在大会上充当了一回主人。一报还一报，运动满足了群众，群众就得配合运动。事实上，习惯于运动游戏的群众本来就没把自己揭发批判当真，运动不需要事实，重要的是气已经出了。领导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群众把被批斗者“放”了，双方满足了，运动圆满结束。掌握运动的技巧可以概括为“两头放”。

## 5、自我消解

尽管绝大多数运动的对象在运动结束时都被“解放”了，但运动并不是无事找事。代价极大的运动不是没有收获，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教育干部，锻炼群众。

运动总要整人，“运动来了”无异于“狼来了”。运动时期的干部确实老实得多，诚实得多；即使运动过后，不期而来的下一次运动以及随时高悬大他们头上的揭发、批斗和处理，也真的令他们有所顾忌。但这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信念和公益之心，而是出于谨慎之心，是政治上的取巧。所以屡经运动的干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狡猾，他们学会了如何借用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掩饰自私的动机。“陈龙永知道，如果他和别家吃喝了，一旦再来运动，就会有人指控他：‘某某人的儿子在公社工厂里找一份工，因为他家跟龙永有交情。’如果龙永跟别人（哪怕是贫下中农）有私下来往，如果他不保持冷漠，不和别人拉开距离，就会有人怀疑他的无私和正直。”（P 91）二是消极：“忍屈受辱的牛棚生活使得庆发温和得多了，他再也没有爬回掌舵人位置的强烈野心。人到中年，他对于能在权力的神龛中占一小角位置，担负点普通责任，似乎已心满意足。十年前，庆发是‘厉害如虎’，如今则‘温顺如羊’。他变得机巧伶俐，善于迎合村民感情，他跟年轻人说笑，甚至还说‘落后话’。”（P 235）无论是陈龙永还是陈庆发，都没有按照运动指定的方向变化，但都学会了与运动和谐共处。照此下去，只要运动还得整干部，它就一定达不到目的。

群众在运动中获得了公开批评干部的权利和机会，也因此形成了干部并不可怕的观念。“大四清”后，陈庆发以为没事了，就欺侮了一个向懦弱的农民，“四清运动也许没能让庆发学到教训，却教会了这个农民新的胆量。他再也不甘受人欺压欺凌”。（P 88）就向工作队告发，庆发因此下台。但这起“民告官”的事件只是由于工作队的介入才获得群众预期的效果。严格地讲，运动式的锻炼只是群众在上级的保护下不负责任地报复干部，它所提供给群众的只是周期性地释放已经积聚起来的怨气，却不可能培养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由于群众的不满和怨气已经得到释放，就再也不会欲望对权力进行合法的监督。而且由于运动过后干部照样是干部，因此群众的揭发事实上不可能矫正干部的行为，群众自身反而会因为一次又一次没有意义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运动也有积极功能。没有限制的揭发和无所顾忌的批斗形成恐怖气氛，造成每个人的心理紧张，使一些坏人坏事得以暴露。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村的赤脚医生因为支持此时已被打倒的陈庆发，陈龙永想整他一下，就组织人去查他的医疗帐目，结果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但在后来的审讯中，由于恐怖的气氛，虽然上头说的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一套，可是这个年轻的赤脚医生却完全慌乱了，他自己招出一年前奸污了一个十二岁的女性病人的事。”（P 154）但说到底，这个医生既不是运动的对象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自我坦白的刑事犯，完全可以靠法律而不靠运动来惩处。这一成果只能算是运动的副产品。

那么运动的真正产品是什么呢？是自我消解，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陈村就这么多人，农村就这么多事，开始时还可以折腾一些问题出来，把干部之间的私怨、村民中的纠纷，甚至男女私通都上升为政治。但运动不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到底有限，不可能次次花样新翻；况且无论怎样突出政治，陈村的干部群众也不能以运动为生，所以他们参与运动的方式只能是单调地重复：这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连程序、罪名都差不多，严肃的运动终于成了滑稽戏、讽刺剧。加上不得人心的政策、经济停滞、人际关系紧张等等，都使陈村人明白：“运动本身成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道出了‘空头政治’的无聊僵木。”（P 232）70年代，当下放知青感到幻灭时，本地出身的知识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取代了下放知青曾经占据的位置，但他们不愿意得罪本乡本土的长辈，陈村已很难找到运动的积极分子了。1973年批林批孔时，村民们开始对运动的冷嘲热讽：“我们的生产搞不好，就是因为林彪嘛！他不叫我们种瓜种菜，就是想饿死我们嘛！”（P 231）“每回北京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场新运动，他们便不满地哼哼起来。”（P 230）

只是，陈村人对运动的反感并不是理性的觉醒、人性的觉醒。由于运动总是以理想和信念为号召，对运动的失望就伴随着理想的幻灭和信念的动摇，从此犬儒之风盛行。以阿鸥为例，她四清时是毛泽东思想员，文革前担任大队广播员和团支部委员，文革期间一度是大队的领导人之一，曾以狂热的“疲劲”和出色的审讯术狠整她认为是“反革命”的知青王胖墩和邓华侨，不但自视甚高，也被公认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1969年，她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没有进入村委会；1969年因同样原因而没有入党；此后她连现有的职位也保不住了，因为本地农家子弟也有了教育，一些低级干部的位置就不劳下放知青代劳了，“讽刺的是，这些年来一些知青特意不辞劳苦，教会当地积极分子如何演说和清帐之类的本事。阿鸥后来带着辛酸的口吻抱怨道：‘我们这可是作茧自缚，自毁前程哪！’”（P 207）随着“文革”的真面目逐步暴露，阿鸥的脑子里也充满问号。1971年，上级决定把邻近香港的大部分知青转移到海南岛，有特殊情况，如已婚的、独生子女、有特殊技能的、村里需要的等除外，“对于这种安排，阿鸥就是冒火的一个。难道说有专长的赏识，有家庭影响的可得报偿，但是一个贡献了十年政治生命的人就没有要么？‘就算养一条狗，十年哪！’”（P 213）为此受到领导的威胁和批评。1974年夏天，她终于偷渡到过去她斥之为“颓废的城市”香港。阿鸥不是随大流的人，“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本来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我想，农民和干部全在为自己打算。我何必再留在农村牺牲自己。要是这里的人真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我还是愿意留下的，就算物质生活苦一些，自己成不了家，也没关系。但是我想，去他妈的吧！我还是去香港喝牛奶吃面包算了。”（P 216）

运动消耗了阿鸥的青春，也消蚀了运动许诺给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从而运动留下的遗产，就是这种凡事怀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义，这在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初都未曾发生。于是，“有个儿子年方二十的父亲和我们聊起来。他回顾往昔，感叹当年可为年轻人安排活动、增进同伴情谊的那种社会结构已经消失。此人属于七十年代最早跑往香港的一批，他反感令人窒息的集体主义，自不待言，但十五年之后，他反而眷恋起当年的集体生活。”（P 269）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正是那个“理想主义”时代，掏空了一切理想的人性基础和社会条件。



“运动”是直到1979年为止的中国社会的基本节奏，当它的音响逐渐微弱下去之时，知识界对它的兴趣得已慢慢上升，但除了缕述基本文献和大略过程，除了往事追怀和轶事拾零外，我们还鲜有微观的、实证的“运动学”成果。陈佩华等作者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华南农村的运动过程，也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运动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实际展开过程及其后果，注意运动如何把浓烈的政治意识嫁接、殖民到日常关系之中而改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毕竟，无数次的运动在我们中间发生，运动的后遗症迄今仍伴随着我们，为了运动不再，我们特别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清理运动。当然，这需要“运动式”气候的消散。

~~~~~

【史料辨析】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并非揭露林彪

• 金春明 •

这封信的主题是什么？是像江青一伙说的为了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江青本人在批林整风时以权威的姿态对这封信作过讲解。按照她的调子，党羽们整理了宣讲资料，广为宣传。一份宣讲材料中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当然为了能够自圆其说，这份材料中也说：“毛主席虽然在写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五一八讲话’是违背马列主义观点的，但这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现他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搞阴谋”等等。这样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不错，信中谈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如何说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这里毛泽东是讲敌友关系，非常明确地把林彪称为“我的朋友”。毛泽东向来是敌友分明的，这封信中尤其如此。联系到下边，“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就是说，毛泽东本人是要打鬼的。这个鬼，也就是同一封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这个鬼是谁？当时还没有点明。但不到一个月，《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而打鬼不能自己一人单枪匹马，要靠“朋友”的帮助，这个“朋友”当然也不只是林彪一个人，信中有时用“朋友们”就是明证，但首先就是林彪。一个是鬼，是敌人，一个是帮助打鬼的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

第二，“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是信中最集中地讲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看法的一段话，其中确实表达了不满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词的分量是很轻的。“这样讲法过去没有过”，大概是革命导师没有讲过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的意思吧。没有讲过，当然可以包含背离了、违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创造性发展的意思。从这句话里是得不出“不讲马克思主义”，“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这样的政治结论的。

第三，对待林彪讲话的态度，毛泽东虽然承认“违心”，但还是同意发给全党。“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下边，又有一句：“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迫上梁山”，在毛泽东看来，上梁山是一条革命的路，即使是迫，有点不那么自愿，但路总是对的。而林彪的讲话和提法虽然引起他的不安，但动机是好的，又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因此，他“违心”的同意，绝不会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如果说，从信的内容中无论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扬的那种论断，那么，在信发出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本人的实践，则应该是更有力的证明。下面略举数事：

（1）经过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66年9月22日把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发到全党，并在批语中说，林彪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的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这个批语又进一步指出，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当时所能用于肯定和赞扬的词句，几乎全部都送给了林彪。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他是绝不会同意上述批示的。

（2）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确曾于7月25日指示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陶铸：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这同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观点是一致的。

陶铸召集首都各主要报刊负责人讨论毛泽东上述指示后，7月29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说，“使用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坎里的要求”，“不宜突然全部停止使用”。毛泽东又同意了这个报告。而在半个月后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几乎全部接受了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公报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前后矛盾的态度，这涉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基本态度，需要专门研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

（3）在八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在全会临时增加的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列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在八届十一全会公报中写入了这样的话：“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而这个人就是林彪。

综上所述，无论从信的内容本身还是当时的实际活动看，都不能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而只能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有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也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

□ 节选自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载《金春明自选文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原发表于《党校论坛》1989年第五期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一）

• 老 田 •

（黄廉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企业基层干部，文革中担任重庆和四川省群众组织领导人，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1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被隔离审查，1982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4年刑满释放；现居重庆。——编者）

一、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随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我父亲解放前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林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本人7岁到重庆，读过小学，初中二年级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后曾在又新川剧学校当学生，后进入重庆小米市群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求精中学报名，我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中队，校址在万县高级农校。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的是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需要人手，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我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安排我在南京挹江门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后，又转到北京前广平库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1413部队高工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1447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在青岛海军基地加入共青团，后改称海军北海舰队基地。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任政治部办公室宣教干事、秘书等，直到66年参加文革。此间最难忘的是1957年参加的反右斗争。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当敌人处理了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了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还说到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应该让自己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自己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我们的工会工作是虚设，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我这样一讲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

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公司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以此诬我是“内控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曾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木材公司背地里划为中间偏右，可是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录音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在会上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被划成右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如此，一句话主宰别人的生杀大权，不民主怎么得了？对把持党政大权、还想要将权力窃为已有的官僚们，不让群众起来批判斗争怎么能行？还是毛主席说的有理“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二、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群众，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可是四清一开始，就是把矛头指向生产队长和一般农民，工厂里也是把车间主任和一般工人作为对象，我们木材公司是重点把矛头对准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其他单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庆市委抛出早已垮台的干部张黎群就是转移方向，因为张黎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成都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文革一开始市委就派工作组去重庆大学，不几天，一个好端端的校长郑思群就自杀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以假乱真是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各单位市委组织下干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中的保守组织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和各单位走资派的安排，由中学生里面的保守组织出面搞的。不时还有消息传过来，说北京“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他们安排中学生保守组织到处搞打砸抢，起了很坏的作用，后来的“文革史家”们却一致说这些都是造反派干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动路线里，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文革小组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大搞“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组织翻出来整。我在一次本单位的学习会上提出：这些搞法难道还要给地主找接班的吗？把矛头指向“黑五类”（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人），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搞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书记局长才对。我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明里暗里翻出我在57年所谓“右倾言论”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右派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还捏造说我在北海舰队曾经和文工团一个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恋爱。

我说“本人”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历史上也没有“黑巴巴”，“红巴巴”倒是有几个，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共青团员。我接着就举例揭发，公司建造了一栋新房子，我看那些没有住房、几世同堂的人都没有住到，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依我看，公司经理以上的，虽不是走资派，已经有一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你们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

会后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报，半夜我回到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公司里去开会，他们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公司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了“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你们镇压群众运动，你们怕革命，你们心有鬼，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公司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你们害怕群众起来揭你们的问题，你们怕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你们想压制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想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不是你们的奴隶，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公司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传出去了，把我写的大字报给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联的学生。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来调查，公司里的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约本地的学生一起行动，那一天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兴路都扎断了，最后冲了进来，找到了我，将我拥着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转抄过来的北京传单，还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讲话什么的，同时也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德法系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我感到他们很有水平。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